

## 一、前言

香港的少數族裔學生在教育流動性和融入主流社會面對極大的挑戰，有限的中文水平導致這些學生缺乏融入香港華人社會、認識中國文化的動力（Kennedy, 2011；Shum et al., 2011）。他們由於居住地、人群接觸、宗教文化影響等（Chee, 2015；Gu & Cheung, 2016；Lai et al., 2015），甚少有參與社會事務、跟本地華人互動交流的機會，因此更加打擊其學好中文、融入社會的信心。

有調查報告指出，香港有 580 萬的活躍社交媒體使用者，佔總人口的 78%（Kemp, 2020）。香港兒科醫學會及香港兒科基金會（香港 01，2018.07.22）曾以網上問卷形式調查逾二千名小四至中六級學生使用社交媒體的習慣，發現有 43% 學生每日花費 3 小時或以上瀏覽及使用社交媒體，有 18% 的學生甚至每日花超過 7 小時，可見香港學生對於社交媒體的使用相當普遍。學者指出社交媒體的使用對於少數族裔學生學習第二語言十分重要，因為通過社交媒體互動而獲得的語言知識、社交技能和思維方式等，均可整合、應用在學生的日常社交互動中（Sykes et al., 2008），有助他們適應不同社會文化和學習語言溝通技能。然而，目前對於少數族裔學生使用社交媒體來學習語言和適應社會文化的研究仍相對匱乏（Croucher, 2011；Ma et al., 2014），故本文的研究目的旨在探討社交媒體的應用是否有助少數族裔學生適應香港華人社會文化，以填補這一方面的研究空白。

## 二、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的研究目的，本文提出以下的研究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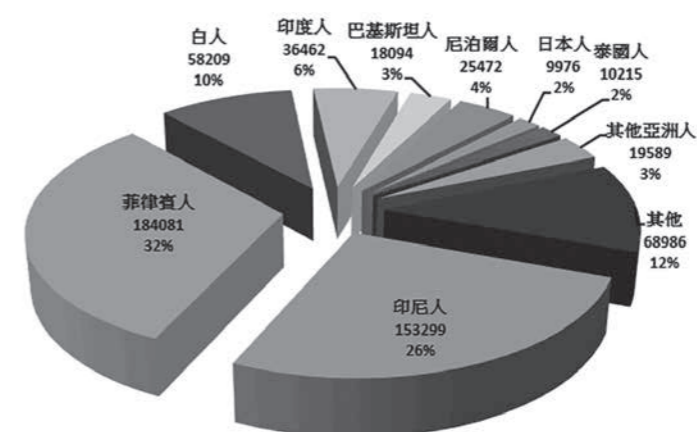
社交媒體應用對少數族裔學生適應香港社會文化有甚麼影響？

## 三、文獻綜述

### 3.1 香港少數族裔的構成及其語言學習

香港是一個以華人群體聚居為主的社會，因其自由開放的社會特徵和經濟體系，吸引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種族、語言背景的人士前來經商、就業和升學。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的人口調查數字，截至 2016 年底，香港約有 584,383 人報稱為非華裔人士，這類人士約佔總人口的 8%，如圖一所示：

圖一：香港不同少數族裔人士的人口總數和所佔少數族裔總人口的百分比，引用自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政事務總署種族關係組資源中心（2016）



從上圖可見，在港的少數族裔人士以菲律賓、印尼、印度、尼泊爾和巴基斯坦裔居多。而面對日漸增加的少數族裔人口，社會各界均須正視他們及其下一代的教育、就業和社會福利等問題，以幫助他們擺脫跨代貧窮的命運（戴忠沛、容運珊，2019），尤其需要提供更多的教育和工作機會，以增加他們的社會流動性。

香港少數族裔學生的中文學與教、以及其融入香港主流社會等問題一直備受學者關注，這些學生因為受制於居住地的環境和有限的中文語言水平（Gu, 2015；Kapai, 2015），通常選擇入讀招收較多相同族裔學生的學校（即以往所稱的「指定學校」designated school），所以他們與本地華人之間的社交互動機會甚少。再加上中文漢字複雜的象

形符號系統以及形、音、義的種類繁多（容運珊，2015），前線教師也欠缺合適的中文第二語言教材、教學法、評估方法（羅嘉怡、謝錫金，2012），更導致這些學生缺乏學習中文的興趣和動機（戴忠沛、容運珊，2018，2020），進一步打擊其學好中文、融入社會的信心。

### 3.2 有關社交媒體 (Social media) 的研究






#### 3.2.1 社交媒體的定義

Kaplan 和 Haenlein (2010) 指出社交媒體是以網絡 (web 2.0) 為基礎的各種應用程式，可以用來創作和交換用戶們原創的信息內容。肖琳等 (2016) 就指出，除了「用戶生成的內容」，社交媒體也應涵蓋「用戶之間的關係」。McCay-Peet 和 Quan-Haase (2017) 也強調了用戶之間的關聯與互動，他們認為社交媒體是為個人、社區和機構提供合作、聯繫、互動、共建社群機會的網絡服務。在社交媒體上，人們可以共同創作、完善和分享各式各樣的用戶原創內容。由此可見，社交媒體並非只是有着大量信息內容的各類科技平台，近年對社交媒體的定義也凸顯了用戶之間的互動及網絡活動的參與度，這些才能真正體現出「社交」的含義。

#### 3.2.2 社交媒體的種類

根據不同學者對社交媒體的歸類 (Kaplan & Haenlein, 2010; McCay-Peet & Quan-Haase, 2017)，下表列出較有代表性的類別及在香港較為知名的社交媒體平台：

表一：社交媒體平台舉隅

社交媒體種類	例子
社交網站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博客、微型博客和論壇 Blog, Microblog and Forum	  

媒體 (內容) 社區 Content Community/Media Sharing	   
合作項目 Collaborative Projects	 
虛擬社區 Virtual Community	
即時通訊 Instant Messaging	   

#### 3.2.3 社交媒體在文化適應過程中的作用

##### 3.2.3.1 文化互滲與少數族群的文化適應

在當今全球化且人口流動加速的社會發展背景下，當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和個人進行互動時，文化互滲 (acculturation) 的過程就開始了，這種互滲會給參與雙方帶來文化和心理上的變化 (Berry, 2008)。關於文化適應的過程，Ward (1996) 提出了兩種文化適應方式，即心理適應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和社會文化適應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前者代表身心健康，後者指個體在跨文化情境中管理好生活的社會技能。Berry (1997, 2008) 提出的文化適應雙維度架構包含傳統文化與身份的維繫程度和在移居地社會的參與程度，當這兩個方面相互交錯時，Berry 認為會出現以下四種文化適應的情況：

- (1) 同化：指積極融入移居社會，同時對自身傳統文化維繫意願持較低的態度；
- (2) 分離：表現為有維繫傳統文化的意願，但拒絕與其他文化進行互動；
- (3) 邊緣化：指個體對傳統文化以及移居地文化均無興趣的一種狀態；

(4) 融合：指在維繫傳統文化的同時，也積極融入移居地社會的策略。

相對於單一的文化傾向，二元文化傾向也就是融合的策略在文化適應上展現更多正面的影響。Nguyen 和 Benet-Martínez (2013) 指出，二元文化主義 (biculturalism) 與心理和社會文化上的適應有着重要、緊密且正向的關聯性。採用融合文化適應策略並構建二元文化身份的個體，會感受到較少的文化適應壓力 (Gonzales et al., 2008)，擁有較高的自尊心 (Berry & Sabatier, 2010)，並出現更多的親社會／利他行為 (Schwartz et al., 2007)。

Benet-Martínez 和 Haritatos (2005) 指出少數族裔多持同化的文化適應態度，但他們在二元文化身份上存在個體差異，該差異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二元文化和諧度 (bicultural harmony) 與二元文化融合度 (bicultural blendedness)。前者指的是少數族裔認為傳統文化與移居地文化之間是充滿衝突抑或和諧共融；後者指的是這兩種文化在少數族裔心裏是有機融合還是獨立共存。在這兩個維度上的差異會影響少數族裔對二元文化的融合程度，從而影響自信心、心理壓力以及對生活的滿意度 (Schwartz et al., 2007)。Lai (2019) 的研究也發現，少數族裔學生對二元文化和諧度及二元文化融合度的觀感，會直接影響他們學習中文的動力。

### 3.2.3.2 社交媒體對文化適應的影響

在現實社會中，城市新移民和本地居民間難免出現隔閡 (韋路、陳穩，2015；Alencar, 2018)。在少數族群融入移居地社會的過程中，社交媒體因其公開性、匿名性、鋪展性 (spread ability) 以及可搜索性 (searchability) 等特點，對少數族群和他們的移居地社會的互動以及和故鄉的聯繫上發揮重要的作用。社交媒體可以提供網上的交流和互動，各種各樣的功能也讓不同用戶在網絡人際交流、發佈和分享信息方面 (Park et al., 2014)，提供很高的參與度。

首先，憑藉着社交媒體的公開性、匿名性，少數族群可以享有平等獲取信息資料、在網絡上發言的機會，以及獲得和他人互動時的安

全感。因此，少數族群有更多機會去接觸本地居民，了解本土文化，增強自身對移居地社會的歸屬感，減輕在文化適應過程中所產生的壓力 (Lai et al., 2020；Mitra & Evansluong, 2019；Park et al., 2014；韋路、陳穩，2015)，從而提升幸福感。

其次，現今社交媒體有着大量信息與多媒體資源，憑藉其鋪展性、可搜索性 (Boyd, 2014)，少數族群可以利用這些資源去表達自己的想法 (Alencar, 2018；Mainsah, 2011)，甚至改變移居地社會對他們的負面、刻板印象。

此外，社交媒體還有助少數族群維繫與故鄉親友的關係，這種聯繫所帶來的情感支持可緩解文化適應的壓力 (Sandel, 2014；Ye, 2006)。換言之，社交媒體可以通過構建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和文化資本 (cultural capital)，為少數族群的文化適應提供動力。

早在 1986 年，Bourdieu 便對有別於經濟資本的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做出了定義。一方面，Bourdieu (1986) 認為，社會資本是個體在自己所擁有的持久且雙向的人脈網絡中累積的實際存在與潛在的資源總和。一個人的社會資本之多少取決於其可有效運用的人際網絡之大小，以及其他資本之影響。另一方面，Bourdieu 也將文化資本劃分為內化 (embodied state)、物化 (objectified state) 和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ed state) 三類。首先，內化狀態是指通過一定時間的學習從而獲得習慣或才能，不是一蹴而就的或可瞬間轉化的。其次，物化狀態有兩種解讀方式，其一，是可以轉化的具有文化含義的物體，如繪畫、雕刻等；其二，與解讀這些藝術品相關的內化文化資本或能力。再者，制度化狀態主要指社會廣泛認可的標誌，如學術資格或其他證書。本文的研究視角則着重在內化狀態的文化資本。

#### 3.2.3.2.1 社會資本—與移居地的接觸及與原住地的情感維繫

少數族群與移居地居民的互動以及由此建立起來的社交網絡，是構建其社會資本的重要基礎。社交媒體的使用可以幫助移居者擴大交友範圍，提升交際適應能力，建立與本地居民的交往圈，從而進一步促進文化和社會適應 (匡文波、武曉立，2019；叔翼健，2018；韋路、

陳穩，2015)。社交媒體有助少數族群平等地獲得信息，以及與本地居民之間的互動交流。頻繁的社交媒體參與可以幫助少數族群建立社交網絡，從而使他們的社會歸屬感和社會認同得到提升。

Mao 與 Qian (2015) 指出，社交媒體對橋接型社會資本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與緊密型社會資本 (bonding social capital) 都有重要的作用。橋接型社會資本是指與相識的人或網絡上的陌生人之間的弱連結 (weak ties)，而緊密型社會資本則是與家人和朋友之間的強連結 (strong ties)。Lai 等 (2020) 發現社交媒體的互動性與匿名性，增強了香港的東南亞少數族裔中學生與當地華人的交流，提升他們與移居地居民的情感聯繫，並強化這些學生與當地居民互動的意願與資本。Lai 等也指出社交媒體的公開性，可讓少數族裔中學生更了解當地華人的個人想法與情感，從而獲得日常生活中所缺乏的社會資本。

社交媒體一方面打破了少數族群與所在地居民在現實社會中的隔閡，另一方面也在他們與分隔兩地的親友之間搭起了橋樑 (叔翼健，2018)。除了橋接型社會資本，少數族裔人士通過社交媒體可以維持與親友的聯繫，繼而得到情感上的支持，這種心理上的支持也可增強緊密型社會資本 (Alencar, 2018; Komito, 2011; Lim & Pham, 2016)，提升自身的身心健康 (Lim & Pham, 2016)，緩解融入新的社會環境所產生的壓力 (Sandel, 2014; Ye, 2006)，對少數族群適應移居地社會文化有較大的幫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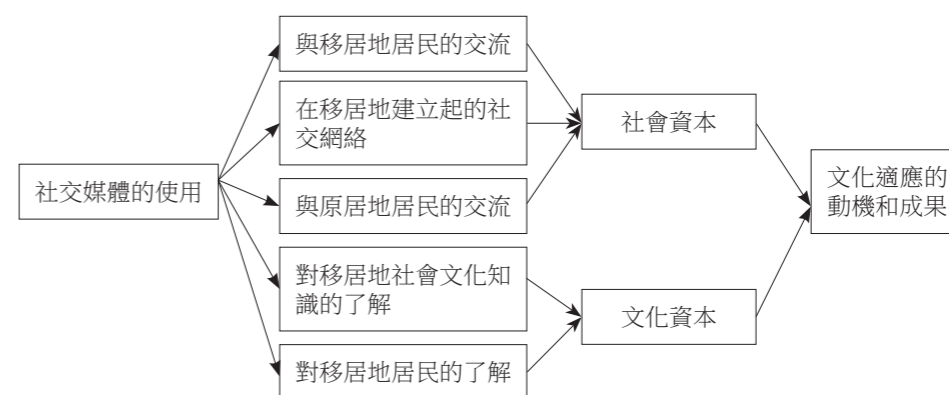
### 3.2.3.2.2 文化資本—對移居地文化的了解

Lam (2012) 指出，文化資本可以體現在與不同地域性群體在網絡上的連接，繼而發展出的語言技能、社會關係、信息資源和觀察事物的視角。少數族群在現實生活中接觸到的移居地文化往往有限，社交媒體賦予他們去了解移居地社會文化的機會，從而為在現實生活中與本地居民進行互動交流作準備，以提升他們學習移居地主流語言與融入當地社會的動力 (Lai et al., 2020)。Lai 等 (2020) 指出，社交媒體可以幫助香港少數族裔學生獲取與中國文化、當地華人相關的知識，這些知識是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難以接觸到，但對於融入香港社會

是極其重要的。Lim 和 Pham (2016) 通過研究一所新加坡大學裏的留學生後也發現，作為一個可用於文化適應的網絡空間，社交媒體可讓留學生深入了解本地人對待外國人的態度，有助他們在和本地人交流前做好準備。

綜上所述，通過社交媒體構建與擴充的社會和文化資本，有助少數族群更好地適應移居地文化並與移居地居民有效交流。因此，少數族群的社交媒體活動對其文化適應有着環環相扣的重要作用。下圖總結了社交媒體活動對文化適應所產生的影響：

圖二：社交媒體對少數族群文化適應的影響



由此可見，社交媒體的應用對於少數族群適應不同社會文化有重要的影響。本論文建基於前賢學者的研究成果，以香港中三至中六級的少數族裔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使用社交媒體對其適應香港社會文化的影響，開拓有關社交媒體應用在香港少數族裔學生文化適應上的研究領域。

## 四、研究設計

### 4.1 研究對象

參與本研究的少數族裔學生主要是來自巴基斯坦、菲律賓、印度和尼泊爾等南亞裔國家，並就讀中三至中六級。之所以邀請這些級

別的學生參與本次研究，是考慮到中三至中六級的學生心智年齡較成熟，相比小學或中一、中二級的少數族裔學生有更大的機會可以自由使用社交媒體，並掌握不同社交媒體軟件的使用功能。另外，參與學生大多屬於社會經濟條件較低的群體，但其家庭仍能支持他們使用電腦或智能手機以及上網。小部分學生即使家中未能上網，但仍可在學校內使用電腦來上網。參與本研究的少數族裔學生全部都有使用社交媒體的習慣，他們使用社交媒體的語言包括了英文、中文及其本族語言。

本研究以方便取樣的方式，邀請全港不同學校的少數族裔學生參與，資料如下：

- (1) 半結構式訪談：來自港島、九龍、新界不同學校的 44 位學生
- (2) 問卷調查：來自港島、九龍、新界不同學校的 565 位學生

參與學生都以中文作為第二語言，中文程度以中等至稍遜為主。他們主要是在中文課堂上接觸和學習中文，認識的本地華人以所在學校的本地老師和同學為主。這些學生與本地華人的接觸程度較低，交流方式主要是與本地華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他們也甚少參與本地華人組織的社交活動。

表二：少數族裔學生在日常生活中與本地華人接觸的程度

日常生活中與本地華人接觸的程度	平均值 (Mean)	標準差 (SD)
與本地華人日常交流	3.04	1.116
與本地朋友日常交流	2.97	1.310
參與本地華人組織的社交活動	2.72	1.166
與本地朋友外出活動	2.45	1.284

註：2= 很少；3= 有時

## 4.2 研究方法

本文是一項融質性研究和量性研究於一體的混合性研究，參考 Lai 與 Gu (2011) 的方法，主要採用半結構式訪談和問卷調查等研究工具進行數據收集。

### 4.2.1 半結構式訪談

研究者邀請參與學生進行個人訪談，訪談時間約為 30 分鐘。訪談主要以英文進行，但有個別學生表示其中文水平較英文為高，研究者則改以中文粵語進行訪談。研究者把全部訪談錄音轉錄成逐字稿，並由兩位研究助理作詳細的錄音核對和檢驗。在完成訪談逐字稿後，運用口語資料分析法 (protocol analysis)，先進行剪貼分類，瀏覽整篇逐字稿，再仔細找出和研究相關的部分進行分類和編碼，並作深入分析。

### 4.2.2 問卷調查

所有參與本研究的少數族裔學生均須進行一份問卷調查，問卷內容以英文顯示。問卷調查的內容主要是有關學生使用社交媒體的基本習慣，例如使用社交媒體的種類、使用方式，以及使用社交媒體對他們融入香港社會、認識香港本地文化的看法等。本問卷在正式實施之前，先邀請 6 位就讀不同中學的少數族裔學生進行測試，以檢視和評估問卷的難度及有效性，確保問卷能符合少數族裔中學生的基本認知水平，有助正式參與的學生能在限時之內完成問卷的全部答題。在參與教師和研究助理的監督下，學生通過紙筆的方式完成問卷。研究助理全程參與問卷收集，以協助或解答學生的疑問。問卷的數據輸入則經過研究助理的雙重確認，以確保準確度。

## 五、研究結果與討論

### 5.1 少數族裔學生的社交媒體使用情況

本研究發現，香港的少數族裔學生平均每天使用社交媒體 4 小時。由問卷收集的數據可見，這些學生最常使用的社交媒體平台依次為：YouTube (M=4.49, SD=0.77)、WhatsApp (M=4.07, SD=1.05) 和 Instagram (M=4.04, SD=1.22)，而網上論壇 (M=1.83, SD=1.12) 和 Twitter (M=2.03, SD=1.32) 則是參與問卷調查的學生較少使用的，詳見以下表三。受訪學生也提及 WhatsApp、YouTube、Instagram 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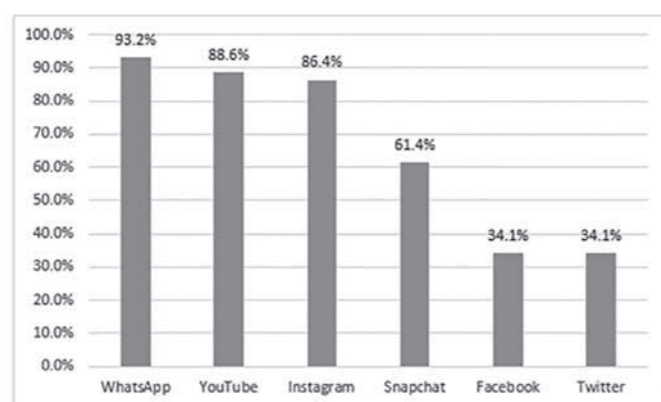
Snapchat 為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的社交媒體。

表三：問卷調查顯示的少數族裔學生各社交媒體的使用頻率

社交媒體平台	平均值 (Mean)	標準差 (SD)
YouTube	4.49	0.77
WhatsApp	4.07	1.05
Instagram	4.04	1.22
Snapchat	3.08	1.45
Facebook	2.39	1.31
Twitter	2.03	1.32
Discussion Forum	1.83	1.12

註：1= 從不使用；2= 很少；3= 有時；4= 經常；5= 非常頻繁

圖三：訪談中提及各社交媒體平台的學生百分比



從學生的訪談可知，WhatsApp 和 Snapchat 主要用於和朋友、同學以及家人之間的聯繫與交流，而 Instagram、Facebook 和 Twitter 則是他們結識陌生人的渠道。相較之下，YouTube 的娛樂和自主學習功能就遠大於社交功能。本研究的問卷數據顯示（見以下表四），最多學生使用與朋友、家人和同學交流或增進聯繫的社交媒體，如 WhatsApp (M=3.57, SD=0.98)。其次，他們也使用搜尋資訊的社交媒體，如 YouTube (M=3.18, SD=0.98)，而他們最不常用的就是與陌

生人交流的社交媒體，如 Facebook (M=2.83, SD=0.90)。

表四：少數族裔學生使用社交媒體交流的性質

社交媒體交流的性質	平均值 (Mean)	標準差 (SD)
使用與朋友家人交流的社交媒體的頻率	3.57	0.98
使用搜尋資訊的社交媒體的頻率	3.18	0.98
使用與大眾交流的社交媒體的頻率	2.83	0.90

註：2= 很少；3= 有時；4= 經常

而根據表五的資料可見，相較於用社交媒體與本地華人交流 (M=2.79, SD=1.08)，少數族裔學生更常用社交媒體來加強與同種族人士的交流 (M=3.27, SD=1.13)，或與其他國家的人士交流 (M=3.05, SD=1.19)。大部分與中文、中國文化或是本地華人相關的社交媒體活動頻率，都處於 2（很少）和 3（偶爾）之間，可見他們通過社交媒體對移居地社會也就是香港的接觸是極其有限的。

表五：少數族裔學生使用社交媒體的互動對象

社交媒體互動對象	平均值 (Mean)	標準差 (SD)
與本族人交流	3.27	1.13
與其他國家的人交流	3.05	1.19
與本地華人交流	2.79	1.08

註：2= 很少；3= 有時；4= 經常

根據本研究的問卷數據資料（見表六）可知，少數族裔學生使用社交媒體參與跟香港、中國文化或本地華人相關的網絡活動，最常進行的活動是獲取信息 (M=2.75, SD=0.92)，其次為社會參與 (M=2.50, SD=0.95)，他們最不常進行的活動是與不認識的華人交流 (M=2.23, SD=1.03)。但無論是哪一類活動，他們的參與度都偏低。